



大外交家

第三卷

万隆会议展雄才

李连庆 著

周恩来



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万隆会议展雄才

李连庆 著

大外交家

周恩来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萍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外交家周恩来:全6册/李连庆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6802-9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1956号

大外交家周恩来

DA WAIJIAOJIA ZHOU ENLAI

李连庆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37.75 插页:12

字数:1980千字 印数:00,001—30,000册

ISBN 978-7-01-016802-9 定价:378.00元(全6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李连庆同志的新作长篇纪实文学《大外交家周恩来》出版了。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它为当代和后人研究周恩来的生平又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好材料。

举世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者和奠基者，是世界公认的伟大外交家。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和建树，在中国和世界外交史上是首屈一指的。他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那高超的外交战略战术思想，灵活的外交技巧，崇高的道德品质，超人的天赋才华，独有的外交风格和巨大的魅力，赢得无数朋友们、各式各样的对手乃至敌人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重。周恩来是中国的骄傲！

李连庆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经常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教诲，同时也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进行过比较深刻而广泛的研究，熟悉和掌握大量的资料。李连庆又是一位作家，出版了许多文学著作。这些都是他得天独厚而别人所难有的有利条件。

《大外交家周恩来》主要是依据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大量史料创作的。在选材方面，作者特别注意那些体现周恩来非凡性格和光照日月的材料。为了增加作品的艺术性和生动性，作者在某些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上、语言表达上，尽量将丰盈的生活

大外交家周恩来

细节糅进去，使宏观的历史框架和人物的具体活动有机交融。通过历史事件了解周恩来的外交生涯，又通过他的外交生涯了解他的精神风范，令人顿悟，令人起敬。以史为文，文史结合，纪实文学才有感染力。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是做了努力的，而且用纪实文学形式写领袖人物也算是国内第一次才有的。作者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大外交家周恩来》共6卷，写周恩来各个历史阶段外交生涯的主要方面，分“执掌外交部”“舌战日内瓦”“万隆会议展雄才”“鹏程万里行”“行程十万八千里”“光辉映晚霞”等。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6卷书，将是一幅体现整整一个时代精神、感兴于领袖人民性内涵的五彩纷呈的历史画卷。

是为序。

耿飏

1998年3月5日

目 录

序	耿 飏 1
引 言	1
一、酝酿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	4
二、首先出访印度、缅甸	21
三、纵论国际形势和开展和平共处的对外关系	70
四、围绕台湾问题展开外交斗争	97
五、尼赫鲁访华	126
六、吴努接踵而来	163
七、亚非会议是日内瓦会议的发展	201
八、制订出席亚非会议的方针	215
九、两条路线的斗争	249
十、周恩来紧紧掌握路线斗争的主动权，小组会议开锣	272
十一、亚非会议顺利闭幕	304
十二、访问印度尼西亚	324
十三、硕果累累	338

引言

1954年8月1日，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访问东德、波兰、苏联、蒙古之后，回到北京。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张宗逊等党政军领导人和数千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凯旋的周恩来及代表团部分成员。

周恩来英气勃勃、精神抖擞、一脸笑容，走下飞机，但他的脸上由于过度疲劳而显露出丝丝倦意。早已站在扶梯旁等候的朱德、刘少奇等趋前一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朱德一向崇敬和关心周恩来，他亲切地说：“恩来，你又建了大功，但工作太累、太紧张了，应该休息一段才好。”刘少奇也立即说：“老总说得对，要好好休息，我来安排。”

周恩来忙制止说：“不用了，谢谢你们的关心。”

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邓颖超亲切而又体贴地说：“恩来，我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紧张，比在国内还加倍地忙，很少有机会休息，睡眠又极少，我建议你听老总和少奇同志的话，休息几天，必要时我也可请假陪你。”“那怎么行呢？”周恩来有点不高兴地说，“几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积压了许多事情要办，许多文件要批。会议后形势大好，正是乘胜前进，大力开展工作的时候，怎么去休息

呢？”邓颖超深知周恩来的心理和脾气，因此，也就不再多说，由他去了。

当天夜里，周恩来走进颐年堂毛泽东的居处，向他汇报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他，对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战友说：“恩来呀，你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是个外交大胜仗，印支停战协议达成了，中国登上世界五大国的地位，最痛快的是把美国佬杜勒斯给整了，应该大大地嘉奖，不过这个奖品很特别，刚才我和老总、少奇商量了，让你好好休息一个月，颖超同志陪你去，地点也给你选好了，东北的大连，你看如何？”“主席，这怎么行呢？”周恩来恳切地说，“日内瓦会议我们赢得印度支那战争的停火，朝鲜局势的稳定。现在国内外形势喜人，正是我们乘胜前进、锦上添花，推动国际国内形势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有许多工作要做。马上就要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要代表政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要大展宏图，进行经济建设。要向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作日内瓦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出新的外交斗争任务。越南范文同副总理明天就到北京做过境访问，随后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来访。国庆五周年许多国家元首、总理如金日成、赫鲁晓夫、贝鲁特、于哥夫等来参加。接着尼赫鲁、吴努相继来访，还要同印尼谈判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这么多重要的事情，我作为总理，主席，你看我走得开吗？主席、老总、少奇、中央关心我的健康，非常感激。请放心，我的身体很好。”

“我原先考虑你太累了，应该休息一段时间，反正党中央有少奇，政务院有陈云，中央军委有彭德怀。你离开一段短时间也是可以的。”毛泽东停顿一下，眼睛看着周恩来，又说，“是的，恩来！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日内瓦会议给我们赢来了国际和平环境，援朝援越的任务可以减轻一点，军费也可少一些，利用这个机会，腾出手来进行经济建设，加强我们的国力。因此，看来离开你这个总

管家那是不行的啊！不过你千万要注意休息，不要那么通宵达旦地工作。同时，我建议你物色和培养一位外交帮手，减轻一点负担，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大小事都自己干怎么得了。”

“我赞成主席选一个外交帮手的意见，最好请主席遴选一位。目前第一步把张闻天调回，让他主持外交部的常务，同时拟调进一批德才兼备、文化水平高又有工作经验的中高级干部充实外交队伍。”“那好，我考虑你的外交帮手人选，你自己也物色，总之要选一位能干的。”毛泽东连连点头，说，“现在外交工作大开展，我也同意尽快选调一批优秀骨干，加强外交部和其他涉外部门。”

一、酝酿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他费尽了心思，同参与起草的各方面代表专家反复商讨、研究、推敲，确定了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关于外交政策，他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的特点》的报告中说：“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明确规定了保障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即保障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经由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修改、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称：“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当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以后，周恩来立即以外交部部长名义发送各国使馆，并根据这些原则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经济关系。1952年4月30日，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上述原则，他明确而又具体地说：“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手续，我们要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

国家是真诚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外交关系，那就可在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消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这样的外交政策，在中国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也反映出来了。如周恩来在同苏联外交部部长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就明确写上：“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的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就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又考虑到帝国主义给亚非国家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彼此间常因此而发生纠纷，中国同周围邻国之间也因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旧中国也有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确立些原则进行处理，并建立起新型的外交关系，以维护其独立、主权、自由、和平、友谊。因此，他根据历史的经验、当前的现实情况，反复地进行调查研究 and 深思熟虑并同外交部的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伍修权副部长及司长们、法律专家们多次探讨，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更科学、更完善、更切合实际的新型国际准则，这样既可维护我们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又可稳定四方发展友好关系。中国重视同印度的关系，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是亚洲大国。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印度

的地位和作用。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派老红军袁仲贤上将出任驻印度大使，当时的中国驻印度使馆和大使，在外交级别上同中国驻苏联使馆一样是最高的。1951年1月26日印度国庆，毛泽东出席印度大使潘尼迦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在祝酒词中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友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周恩来在1951年2月6日与印度驻华代办高尔谈话，当高尔说中国是亚洲的老大哥，印度是小兄弟时，周恩来当即说：“我们不把印度看作我们的小兄弟，印度是一个大国，是和我们一样的，我们和印度是老朋友。”把印度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

的确，中印两国人民是老朋友，两国有着3000多年的友好交流的历史，这样长的友好交流历史在世界上那是极少有的。中国和印度在古代文学、天文、数学、医学等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中国和印度的神话与寓言中都有月亮中有兔子的说法，有鸚鵡入水沾羽扑灭火山感动天神的故事。中国和印度的天文学家都把太阳在天上经过的道路叫作黄道，并把它分成12段。因此，历史学家们推测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可能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即便根据确切的历史记载，有文字可凭的，在2000多年以前中印两国就有了使者的往返和文化、经济的交流。

两国人民的祖先以惊人的毅力和决心，穿过渺无人烟的大沙漠，越过号称“世界屋脊”的冰川雪岭，渡过惊涛骇浪的大海，历尽千辛万苦，备尝饥寒酷热，忍受现代人所不能想象的艰难，缔结了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人们知道，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蚕丝就传入印度。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任君主月护王的侍臣侨里耶著的《治国安邦术》(Arthasasta)里就有这样一句：侨索耶和

产生在支那成捆的丝 (KauSeyam Cinanattasea Cinubhimizah)。这里所说的“支那”就是指的中国。印度的许多古籍，如《摩奴法典》(Manysmlti)、《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罗摩衍那》(Ramayna)，也有多处讲到中国的丝。公元前 100 多年中国的使者到了中亚细亚的“大夏”国，即现在的阿富汗境内，他发现当地有从中国四川来的布和竹子做的手杖，觉得很奇怪，向当地人打听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从南方一个叫“身毒”（中国古代称印度为“身毒”）的大国来的。因此，他推测当时存在着一条从中国四川往西南通往印度的商道。中印两国在古代的物资交流是非常频繁和广泛的。印度人把许多来自中国的东西加上了“支那”的字样。如把瓷器称为“支那米底”(Chinamitti)，意思是“中国的土”；把花生称为“支那巴达姆”(China Badam)，意思是“中国的杏仁”。印度也有许多的货物传到中国，如珍珠、白玉、玛瑙、水晶、胡椒、生姜、豆蔻等等。值得一书的是，在上古时代，国家和国家、部族和部族的来往都是从战争和交换物品开始的。而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一开始就是由彼此交换物品成为朋友，却没有发生过战争。尼赫鲁也说，印度历史上多次遭到异族入侵和统治，而中国从未同印度打过仗和入侵过印度。这是极其珍贵的友谊。中印两国政府之间外交关系也可追溯到公元以前。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汉朝的使者到“身毒”，开始了两国政府人员之间的交往。《汉书》里就记载从汉武帝的时候，既从公元前 2 世纪开始，中国政府曾几次分别从陆海两路派使者去印度。如公元前 117 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分派副大使到大夏、大月氏、安息、身毒等国去联络，并陪同这些国家的使者回到中国。东汉明帝的时候，那时中国把印度称为“天竺”，在公元 65 年，汉明帝派蔡愔出使天竺求佛像、佛经，他用白马驮了 42 章佛经和释迦牟尼佛像回来，还请来了印度学者迦叶摩腾 (Kasyap Matarag) 和竺法兰

(Dharmaraksa)，两人同时到达首都洛阳，翻译佛教经典，并在洛阳修建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中印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从北印度到南印度，各国不断有使节到中国来。中国政府也派使者到印度去。7世纪时，北印度重新成为一个大帝国，皇帝的名字叫戒日王。戒日王同唐太宗曾几次互派使者，公元641年印度使者到中国来，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也派使者到印度。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使者叫王炫策。他不像以前的使者那样，仅仅完成一次临时性的联系任务便回国了，而是长期驻在印度代表中国政府和印度接洽事务，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大使”了。

当印度的佛教传播到中国之后，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可以说是最辉煌最重要的篇章，佛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至大至深。大约在公元前2年，大月氏人伊存曾教过中国学者景庐佛经。那时，大月氏统治的地区很大，包括现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国流行起来了，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上自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受到佛教的熏陶。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中印文化交流掀开了新的一页，佛教成为热门，许多学者在研究传播佛教文化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功绩最大、声名最高的有中国的法显、玄奘、义净，印度的鸠摩罗什（Kumarajika）和菩提达摩（Badhi-DhUrma）。

东晋时代的法显，他于公元399年出发到印度，414年回国，历时15年。他从长安向西南由陆路经过戈壁、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到印度，由海道回到中国的山东，经过了30多个国家。他带回并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还将他的见闻写了一本书，叫《佛国记》。这本书成了考察5世纪初年亚洲历史的重要史料著作。

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年，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国的公主，龟兹就是现在中国新疆的库什，可以说他算是兼有中印两

国血统的人。他在公元 402 年到达西安，在那里讲授佛学和译书达 12 年之久，翻译的大乘佛教经书有 300 卷。

达摩是印度的高僧，本是南天竺的王子，出家为僧。他于公元 527 年从孟买坐船到达中国的广州，梁武帝遣使迎接他至南京，与其谈论佛理，后来渡江北上，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 9 年，创造了禅宗，为佛教一大门派，称禅宗始祖，后传至唐朝慧能，禅宗日益发达，影响中国儒家学说以及宋朝理学的勃兴，到明朝，中国理学传入欧洲，而有大哲学家康德的崛起。

玄奘是公元 7 世纪唐朝初期一位著名的和尚和学者。他从中国西安出发，途经西域许多国家，徒步 5 万多里到达印度。他在印度学习佛教理论差不多有 17 年之久，尤以在印度最主要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待的时间最长，和寺里 1000 多名和尚一起研究佛教理论和印度其他学术。玄奘随后又在印度周游列国，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全境 138 个国家，记述这次旅行的著作是有名的《大唐西域记》，对这些国家的疆域、城市、人口、风情、故事，都有确切记载，内容非常丰富，已成为研究印度和中亚古代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印度人认为玄奘对于印度的贡献怎样估价也不算高。玄奘回国时，从印度带回金银佛像 7 件，657 部经书，由他本人翻译出汉文的有 75 部，共 1335 卷，把印度的佛学介绍给中国，他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重大的贡献。现在玄奘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在印度几乎是一位无人不知的中国古代学者，在中国更是人人皆知的人物，尤其是作家吴承恩取材于他到西天（印度）取经的故事而写成的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连儿童都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现在这部小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列为世界古典名著。在中国和日本，被拍成电视连续剧。

义净是在公元 671 年唐玄宗时代，从海路经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到印度的，直到 695 年回国，在国外一共住了 25 年，主要居

住印度。他着重研究佛教的戒律，也就是佛教徒应该遵守的生活方式。他翻译了许多有关戒律的书。这些书不仅说明了和尚的生活规则，也记录了古印度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从印度带回的书有 400 部，由他自己译成汉文的有 56 部 230 卷。到了宋朝，宋太祖曾派僧徒 300 人，到印度寻求佛骨舍利及梵文佛经。明成祖时，郑和七下西洋，也到了印度沿海地区，如喀拉拉邦果青北面的卡利卡特，并把锡兰的佛手载运回国。郑和的翻译、航海家马欢到过孟加拉，回国后把见闻写成一本书，名叫《瀛海胜览》。据说当时印度东海岸 11 国遣使来明朝朝贡。

由于佛教的传播，中国人民向印度人民学到了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等不少知识，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通过文化交流，印度人民也向中国人民学到了不少东西，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先后直接或间接地传入印度。如义净所著的《梵语千字文》中讲到至迟在 7 世纪末叶纸已传入印度。纸的使用对于文化的传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中国的瓷器很早就传入印度，在印度许多博物馆里收藏许多珍贵的中国瓷器，印度考古学家曾在印度发掘出中国古代的钱币。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等著作，早就被译成梵文传至印度。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印度国大党在尼赫鲁的支持下，派出了以阿塔尔医生为首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等前来中国，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柯棣华还在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9 年 8 月，尼赫鲁曾到中国重庆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友好访问，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缅甸，想与进攻苏联的德军会师印度。印度的防务成为同盟国的重要问题，在印度建立了美英援助蒋介石政府的补给和训练基地。1942 年 2 月，蒋介石

和宋美龄访问印度两周，与英国当局商谈抗日战争有关问题，还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真纳等人。1942年4月，中印两国互设专员公署，1946年10月升格为大使。

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是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因为印度长期遭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经济极端落后，人民生活非常困苦，独立后的印度，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巩固其独立地位。作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审时度势，采取了一个明智的现实的外交政策，即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军事集团结盟，既同西方国家保持关系，又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得印度既不介入东西方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纠葛中去，又能使双方谁也少不了它，可以左右逢源，坐收渔翁之利。尼赫鲁有句名言：“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明智的政策。”他还多次强调：“除了我们有热爱和平的传统外，和平的环境对印度的发展与进步是十分有利的。”而与印度毗邻的中国这个世界大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同属东方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友好交往，近代又同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同的命运，有着相同的理解、相同的同情。因此，尼赫鲁当时认为必须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借以抵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维护印度的独立和主权，提高其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地位。这是尼赫鲁思想和印度政策的主导方面。印度主张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应该归还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不赞成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朝鲜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中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但是，尼赫鲁的思想、印度的政策中，也有消极的一面，要继承英国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特权和遗留下来的问题，企图将中国的西藏搞成一个缓冲区，继续占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

周恩来深切了解中印两国3000年的传统友谊和目前存在的一